

与『延安对话』的美国人毕森

袁 剑



增长。”从21日抵达，到24日离开，毕森在延安整整待了4天。7月2日，他们一行回到北平。5天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打响。回忆起这段时光，毕森深感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几天之前，来探访这个充满故事与希望的地方。

记录窑洞里的共产党伟人

6月22日和23日，毕森一行先后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专访，内容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相关议题，得以从一个侧面更全面地了解 and 认识这些领导人的风采。他们的艰苦朴素与坚定信仰，给毕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抗战的事业充满信心，认为只要依靠和发动当时的4亿中国人，就一定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再次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也不能自外于整个世界，它同样是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这些领导人正处于壮年，他们精力充沛，面对提问毫不回避，十分坦率，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毕森注意到，“毛泽东那年43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主要是在德国居住。但他好像丝毫没受到欧风的熏染。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

那短短几天里，毕森记录了窑洞内外所做的访谈内容，这些谈话平实又充满真诚，让他这位初到此地的美国年轻人深受鼓舞。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了这些论断的前瞻性与敏锐性，也让毕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抗战和革命事业的理解与同情。

感受抗战的精神力量

延安虽然身处中国的大西北，但在毕森的眼里，它已经成为理解中国抗战与革命的一座闪耀的中心，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特殊意义。

在延安，细心的毕森注意到当时军民间的平等与团结。他发现领导人的上衣口袋中，除了别着一根钢笔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司令员和普通士兵之间几乎毫无差别。而在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领导们和其他人一样，随意就坐，没有特殊的位子，他们在街头巷尾走动时，也看不到前呼后拥的卫兵对他们戒备森严的保护。

在毕森看来，延安虽然在物质条件上非常简陋，但却比他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充满希望。“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正是这种精神，引领着中国抗战走向最终的胜利。

被这种精神感召的毕森，此后一直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他不但写出了《日本侵华》一书，迅速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还在之后数年间不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政策被军方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尤其对战后的日本处理不当，导致亚洲人民的权益严重受损。因为延安之行，毕森还成了情报部门的监控对象，甚至因“亲共行为”被参议院指责询问，失去在美国各界的任职机会。但是，他一直秉持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仍然继续撰写关于东亚问题的文章，这些当时或见之于世或藏之名山的文稿，现在看来，依然充满了真知灼见。虽然毕森本人久已故去，但我们能从他的记述中，看到他对中国光明未来的热切期望，他心中的期望，后来变成了现实。

稻米、小麦与水利文明

陆 琼



富国强兵

在派遣工匠郑国去秦国修建灌溉渠之前，韩桓惠王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的“疲秦之计”非但不能拖住秦国四面征伐的脚步，反而让自己的国家很快地被并入统一的天下版图。

表面上看来，韩国的计谋确实应该生效。无论在什么时候，修建庞大的灌溉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百里计算的水道需要全新开挖或者重新疏浚，渠道两侧需要适当加固以防止坍塌，用于提升水位或控制水流的一些堤堰水门往往需要以巨大的窠窠和柴捆为基，而放置它们的操作必须同时举数百人之力。类似的水利工程通常需要“发卒数万”，需要大量耗费从各地调配而来的物资，这一切需要通过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且往往要持续数月、数年甚至十几年。在韩国的设想里，有多少民夫投入郑国渠的修建，秦国的军队就会减少多少数量的士兵；郑国渠的修建延续多长时间，秦国就将有多长时间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

始料未及的是，举秦国十年之力修建的郑国渠成功地把湍急的泾河水引向了开阔的土地。在远离渭河的关中平原北部地区，郑国渠带来的水源犹如甘霖般改造了盐碱化的黄土。“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与《管子》中提到的“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相比，郑国渠的灌溉让秦国的田地增加了数倍的产量。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

集体协作

从关中平原出发的秦国军队，他们的粮食袋里装的主要是粟、黍，间有少许大麦、小麦、水稻和各种豆类。汉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气候整体变冷，水稻从北方逐渐退出，小麦后来居上，成为绝对的主力。就此，黄河流域以小麦为主，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主，中部地区稻麦兼作的

谷物种植格局延续到了今天。

从单调的颗粒状麦饭华丽转身为百变的粉末状面粉，只是小麦从“备荒粮”转正的原因之一。小麦的产量和可食用部分占比都比粟、黍高，但它其实并不如后两者耐旱和耐寒。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需要耗水400—600毫米，在播种、分蘖、抽穗、开花、灌浆等节点对水分的要求更高。与其说是因为人们爱上了小麦面粉强大的可塑性和丰富的口感，不如说是各地不断发展完善的灌溉系统支撑了小麦的广泛种植。

在南方，水稻的种植同样需要农业水利工程。在山区，雨季汹涌的洪水总是涌向低洼的盆地，继而冲向下游地区；在平原，湖泊和沼泽边的田地则常常淤积。人们需要最大程度地控制水流，以确保在不同的生长节点上，稻田中始终保持适宜的水量。

在降雨量较小的地区，人们“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或者人工修建水库；前者以在泾河大峡谷下游修建引水口的郑国渠为代表，后者则以宋元时期修建的西藏萨迦蓄水灌溉系统为代表（2021年，西藏萨迦蓄水灌溉系统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灌溉系统通常兼具防洪排水功能，比如位于四川盆地的都江堰；或者早期蓄水、雨季溢流的功能。以类似的大小水利工程为基础，中国农耕区的经济生产逐渐展开。

大陆性季风气候持续影响着中国的平原与丘陵，洪水和干旱始终困扰着辛勤耕作的农民。为了确保小麦和水稻等作物得到合理的灌溉，修建和维护各种水利设施就成为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刚性需求。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工程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在不同的地理围下，宗族、村社或各级地方政府成为组织工作和群体凝聚力的核心。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映射的正是优秀领导者带领众人团结协作共建文明的文化基因。

工程化的水利系统使得水权得以相对明确。不同的集体之间可能会为了水源而发生矛盾；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共享同一水源的人们也

会逐渐形成有章可循的用水契约。在汾河流域，自唐代开始，人们通过“三七分水”的水量分配方案维持着水资源分配的秩序。在黑河流域，清代采用分配用水时间的“均水制”来平衡上下游的用水权利。关于水权的乡规民约和政策法令构成了传统社会的法律基础。

定居与交流

通过引水或排水设施的建设，荒野可以成为产出丰盛良田。农田里的小道和灌渠，纵者称“阡”，横者称“陌”，由此，“阡陌纵横”的乡村便可以成为寄托乡愁的桃花源，但这也使得故土难离。除非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已经超出了应对的能力，否则，对于农民来说，离开完善的灌溉系统和已经明确的水权安排，重新开垦荒地或移民是一件风险很大、成本很高的事情。

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对于那些亟须安定下来的农业移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充足的灌溉水源更有吸引力呢？西汉时期，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田，某种意义上就是灌区建设的代名词。从汉朝肇始，历经唐、宋、元几代的数次建设和当代中国的重新治理，黄河上游灌区凭借优异的农耕条件，一直是西北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青铜峡下游，甚至拥有长期种植水稻的历史，堪比江南鱼米之乡。

从军事上说，“塞上江南”是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的兵家必争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宁夏和河套等灌区却是定居农业的一个展示窗口，也是农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

技术进步

如果到访张掖、银川、呼和浩特等灌区城市，游客们会发现，当地的传统饮食呈现出鲜明的农牧混杂特色。生长于草原或盐碱滩的牛羊肉，跟小麦相搭配，可以形成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单。配合着各类传统或新进果蔬品种，大快朵颐

的人们可能不会想到，呼和浩特的平均年降水量其实不到800毫米，而银川和张掖则低于200毫米，属于科学意义上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从秦汉时期极大程度发展起来的灌溉技术和工程应用，构成了这些城市的骨骼和血脉，是地区发展活力的基本来源。

在蒸发量巨大的新疆，拥有保水功能的地下井渠“坎儿井”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竖井最深处可达100米，而平均深度为30—40米。这说明，竖井和地下渠道的开挖、防渗施工技术，其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中国灌溉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郑国渠，其代表性当然不在于它戏剧化的诞生背景，而在于它体现的技术水平。作为一项无动力自流灌溉工程，郑国渠渠首大约位于海拔445米处，主干渠循435米等高线东流，基本处于灌区最高点，注入洛河时海拔365米。在地形勘测特别是高程的确定上，郑国和他的技术团队显然已经掌握了不少的经验。无独有偶，让人惊叹的是，从地图上看，秦朝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灵渠水道，经过的正是长江和珠江水系之间的最短距离。

从使用角度，从需要双人合力的戽斗到单人操作的桔槔、辘轳，到畜力龙骨水车，再到以水力为驱动的自动化桶车，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步解放了劳动力，提升了农业产出效率和水平。

作为一种人为控制的水资源供给系统，古往今来的各项灌溉工程是中华文明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缩影。顺应和改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中华文明。灌溉技术不但繁育了稻米、小麦等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还催生了独特的水利文明，灌溉技术虽然古老，但不会止步不前，它会和人类文明一起，走向遥远的未来。



伯乐羊祜

崔 庆

西晋名臣羊祜，出身世家，德高行恭，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更是一位善于识人选人的伯乐。他坐镇荆州十年，不仅奠定了晋成统一的基本格局，还为国家选拔储备了众多优秀人才。羊祜临终前，举荐杜预接替自己，担当征南大臣。此时的杜预是度支尚书，负责财政，据说骑马射箭样样不行，但是谋略出众，有极强的全局战略观念。羊祜独具慧眼，杜预从书生华丽转身，成为后来统筹数路大军灭吴的“杜武库”。羊祜的火眼金睛屡发屢中，伯乐传奇不限于此。

用人所长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武帝任命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益州发生兵变，朝廷命时任广汉太守王濬发兵益州，很快平定了动乱，留任益州刺史。他善于讲信立威，让当地各方势力心悦诚服。王濬原是羊祜帐下参军，备受赏识。羊祜的侄子羊暨曾经给叔叔提建议，认为王濬“为人志大，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羊祜却认为王濬可堪大用。后来，王濬历任巴郡太守、广汉太守、益州刺史，晋武帝还要调任他担任大司农。这时羊祜却打断了这件“好事”，给晋武帝上书，要求王濬继续留任益州，此举完全是出于一片公

识人传道

羊祜不仅识人精准，还颇有远见，善于挖掘“潜力股”。羊祜镇守荆州的时候，刘弘是他帐下参军，30岁出头，精明强干。刘弘出身将门，德才兼备，羊祜非常器重这位年轻人，并断言刘弘“他日必镇此地”，是自己的继承人。

刘弘不负所望，转任南北、成长迅速，后来都督幽州诸军事、领马丸校尉，治理北方，卓有政绩。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刘弘出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当年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此时距离刘弘

在羊祜帐下效力已经几十年了。这时，晋朝受藩王内乱影响，荆州刀兵四起，不得安宁。刘弘临危受命，治军严谨，上下同心，迅速平定了南方动乱。同时，刘弘及时安抚流民，“劝农耕，薄赋敛，任人才，有惠政”，很快荆州一带就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

羊祜选贤任能的本领和精神深深影响了刘弘，他也十分注重发掘、培育、锻炼人才，续写伯乐佳话。刘弘到任荆州后，毫无背景，陶侃已经44岁了，刘弘毅然选拔他作为自己的长史，相当于幕僚长。当时，晋朝任命官员看重门第家世，陶侃出身微寒，得到器重实属不易，很快脱颖而出。

陶侃厚积薄发，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带兵平定江夏的张昌之乱，数战而定，扭转了危局。刘弘非常高兴，和陶侃畅谈，赞他颇有羊祜之风。十年之后，刘弘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预言成真，陶侃果然出任荆江二州刺史，治下有路不拾遗的美誉。

志存公家

羊祜多有助勋，为晋武帝所倚重，他的意见和建议很受重视，多被采纳。羊祜识人爱才，但以国之所需为重，不以个人亲疏而论，甘为默默无闻的伯乐，从不以私居功。

羊祜行事向来缜密，向上呈奏或举荐人才，都销毁文本底稿，内

容秘不示人，更不向人邀功。满朝公卿重臣中不少出自羊祜的推举，但都不知道自己升迁是由于他的功劳。所以被举荐的人从不知是羊祜之劳。有人好心劝说羊祜，说行事不要太古板、事事谨小慎微，与人恩惠而人所不知，实在是太吃亏了。羊祜义正辞严，向建议人坦陈心迹，公务机要之事，必须谨慎严谨，决不能泄密误事。羊祜举荐人才，以善处公务为圆心，以国家利益为支点，坦坦荡荡、不偏不废。他志存公家，从不以公权树私恩，从不拉帮结派。他还反复告诫家人，“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这也是绝不能逾越的家规。

羊祜善于选人用人，不仅体现在具体人事上能够画龙点睛，而且将选、育、用作为一项基本策略，着眼长远、一以贯之、久久为功。羊祜到任荆州之初，发现当地人心浮动、局势不稳，百姓的衣食不足，军内也粮草匮乏。羊祜立足固本培元、标本兼治，集中精力推动开发和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实行军垦屯田，保障粮食供应，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安抚荆州百姓，大力兴办学校、推广教育，从中挖掘人才，逐步储备力量，感召之下东吴也有不少人前来归降。十年之间，此消彼长，奠定了日后晋吞东吴、成就大统的坚实基础。

江山代有才人出，伯乐羊祜虽然未能见天下统一，但是后继者杜预、刘弘、陶侃薪火相传，实现了羊祜的理想。人生至乐，莫过于此。